

中国共产党 浙江省组织史资料

(1922.4~1987.12)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浙江省档案馆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 郭宝平
沈自强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

(1922.4~1987.12)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浙江良渚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6开 彩图2 黑白图10 插页5 印张82 字数1280千字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500

ISBN7-80002-725-2/D·129

(¥255.60)

中共浙江省组织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

组 长 沈桂芳 王其超

副组长 乐子型 苗世杰 张 方

成 员 杨福茂 娄德生 俞岩高 周志坤 谢力刚

中共组织史资料浙江编辑组

组 长 苗世杰 张 方

副组长 沈自强 刘克宽

编辑人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少云 王顺成 王道岭 包晓峰 李 凌

邱其发 卓春雷 黄梅英 臧效美

参加过编纂工作的人员

杨春民 琚恒轩 杨雅浚 陈光宽 汪金龙

金延锋 张侯芳

目 录

浙江省政区图

综述..... (1)

第一章 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 (16)

第一节 党组织沿革及领导人名录..... (19)

一 隶属中共中央、上海地方兼区委、上海地委、

上海区委的组织..... (19)

(一) 杭州小组、支部、地委及其下属组织 (19)

(二) 绍兴支部、地委及其下属组织 (27)

(三) 宁波支部、支联、地委及其下属组织 (31)

(四) 温州独支及其下属组织 (43)

(五) 嘉兴独支及其下属组织 (44)

(六) 金华、上虞、枫泾独支和临海县特支及其下属组织
..... (45)

(七) 直属上海区委的中共党团组织 (46)

二 中共浙江省委及其下属组织..... (47)

(一) 杭嘉湖地区党组织 (48)

(二) 宁波地区党组织 (53)

(三) 浙南地区党组织 (54)

(四) 浙西地区党组织 (55)

综 述

浙江省地处亚热带中部，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省以江名（省内最大河流钱塘江，江流曲折，又称浙江），简称为浙。它东临东海，南邻福建，西连安徽、江西，北接江苏、上海。东西和南北的直线距离均为450公里左右。浙江陆域面积为10.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域面积的1.06%。其中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浙江海域广阔，大陆海岸线2200公里，有大小岛屿2100多个。

浙江人才辈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鉴湖女侠秋瑾、革命文学家茅盾、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等，他们的故乡都在浙江。

浙江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物之邦”之称，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和地位。

今浙江省境域，春秋时为越国地。战国时属楚。秦时分属会稽、闽中郡。三国时为东吴所属。唐（公元758年）设立浙江东道、浙江西道两节度使，浙江始作政区名称出现。宋置两浙路。元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明初设立浙江等处行中书省。清康熙初年正式改为浙江省，此后省界境域基本稳定。浙江解放后，省内行政区域几经变动，至1987年底，全省辖有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湖州、舟山、金华、衢州9个省辖市和台州、丽水2个地区，以及89个县（市、区）。浙江省会杭州市。宁波市为计划单列城市。1987年底，全省总人口为4121.19万人。

中国共产党浙江地方组织是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建立起来的。近代浙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之宁波、温州、杭州先后被辟为商埠。浙江开始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国列强在商埠开洋行、办工厂、建码头，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促使浙江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浙江也因此有

了近代产业工人。19世纪80年代浙江民族工业开始兴起，至辛亥革命前夕，全省共创设民族工业企业40余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无暇东顾，浙江的民族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从1912年到1918年，全省兴办的民族工业企业有440家。嗣后又有新的发展。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浙江工人阶级队伍也不断壮大。处在重重压迫下的浙江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身最起码的生存权利，罢工斗争络绎不绝，并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锻炼和提高了自己，由自发的经济斗争逐步发展到自觉的政治斗争，旨在推翻反动的封建统治，以求得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党组织在浙江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1915年9月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浙江的知识界中引起积极反响。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浙江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和接受新思想，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五四”时期出版的《浙江新潮》、《钱江评论》、《新学报》、《曲江工潮》等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第一师范教师陈望道，于1920年8月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它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五四运动和随后的浙江“一师风潮”的斗争，还锻炼和造就了一批人才。这为浙江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准备了干部条件。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发起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沪举行。由于受法租界巡捕房的干扰，会议被迫中止。8月2日，一大代表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游船上续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浙江是全国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地方之一。早在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时，浙江籍的先进知识分子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沈玄庐就成为小组成员（以后又有浙江籍的沈雁冰、邵力子、沈泽民加入）。施存统不久去日本留学，在东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俞秀松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指派，筹建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书记，其8名成员中，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叶天底、沈玄庐等5名为浙江

人。这对浙江建立党组织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第二年，浙江开始建立党、团组织，而团组织的建立早于党组织。1922年4月，俞秀松受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的委派，来杭州筹建团的组织，于当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由俞秀松兼任书记。这是浙江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也是全国最早建立的17处团组织之一。同年8月，中共上海地方兼（江浙）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徐梅坤来杭州建立党组织。由李大钊介绍入党，时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委会书记部主任的于树德，受中共北京区委指派也到杭州建党。与此同时，庄文恭受党中央委派也曾来杭州开展建党活动。是年9月，成立了浙江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由于树德、金佛庄、沈干城3名党员组成。1923年春，杭州党小组扩大为党支部。杭州小组成立后，绍兴（党团）支部（后改中共绍兴支部）、温州独立支部、嘉兴独立支部和宁波支部相继建立。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早期党员沈玄庐及其他进步知识分子在萧山衙前组织发动农民运动，于1921年9月成立了衙前农民协会，发表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这是全国第一个党领导下的新型的农民团体。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了以讨论国共合作形式问题为内容的特别会议（即西湖会议），为实现两党党内合作作了准备。1923年6月，党的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杭州支部的于树德、金佛庄列席了党的三大。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实行国共合作。3月，成立了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浙江也得到了实现。为加强党的工作，在临时省党部中建立了“中共党团”，由宣中华任书记。

在此期间，全省各级党组织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

在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的同时，党的组织有了发展壮大。1926年1月，杭州、宁波均建立了党的地方委员会。3月，建立了绍兴独立支部，5月即扩大为地委。在余姚、上虞、金华、嘉善、临海和诸暨等地也分别建立了独立（特别）支部或支部。团的组织也有了发展，继杭州团支部建立后（杭州支部后发展为地委），绍兴、宁波（建立团地委）、温州、嘉兴、诸暨、临海、金华等地也建立了团组织。以上党和团的部分独立（特别）支部和地委，还分别辖有一批下属组织。

浙江党和团的组织，早期在省内均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党组织先后隶属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党中央、上海地委（有的组织为指导关系）和上海区委（即江浙区委）领导。党的五大后，中央决定在省区建立省委组织。1927年6月，以杭州地委为基础组建了中共浙江省委员会，庄文恭任书记，这才使全省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省委成立后，首先抓了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1927年6至7月，直属省委领导的组织，有1个地（市）委，1个中心区委，7个县委或临时县委，17个独支、特支和支部，7个区委。加上一些地方的基层组织，全省32个县市有党的组织。团组织曾先后隶属团中央、团江浙皖区兼上海地委、团江浙区委领导；共青团浙江省委于1927年6月建立后，才改由团省委领导。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七一五实行“分共”。浙江的党组织遭受惨重损失。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捕牺牲。至7月15日，杭州、宁波两市被捕400人，其中被杀117人。全省党员4月上旬有4000人，至9月底只剩1761人。共青团员从政变前的1100人减少了一半以上。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工、农、青、妇组织全被取缔。大革命在浙江遭到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

中共浙江省委成立时，处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白色恐怖严重。7月，省委组织部和秘书处即遭破坏，领导人被捕。各县组织也有7处被破坏。9月下旬，中央派王若飞来浙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帮助省委改组，由张秋人接任省委书记。此后，省委领导人又作过多次调整（或改组）。先后担任省委书记或代理书记的，还有王嘉谟、陈之一、夏曦、卓兰芳、龙大道、李硕勋、徐英和罗学瓚等。其中张秋人、王嘉谟、卓兰芳、徐英、罗学瓚等人在浙江牺牲。

八七会议为党指出了继续斗争的目标，但会后“左”倾情绪逐渐增长，形成“左”倾盲动主义。浙江党组织也受到了盲动主义的影响，并造成了危害。省委根据中央1927年10月28日来信的要求，筹划和策动了浙东暴动（未遂）和杭城丝厂工人大罢工。结果导致了这年冬季的全省党组织大破坏，省委常委3人被捕牺牲，省委和各县委的关系全遭破坏，全省被捕的党员在300人以上。在严重的白色恐怖

面前，许多党的领导人不畏艰难，坚持斗争，使党的组织陆续得到恢复和发展，1928年还新建立了2个特委。至1929年3月，全省建有党组织的县已恢复发展到40多个，党员达7000余人。

八七会议精神贯彻后，浙江各地纷纷组织农军，进行武装暴动，先后达60余次，遍及50余县。其中1928年5月的宁海亭旁暴动，建立起浙江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亭旁革命委员会。

1929年4月，中央决定暂时取消浙江省委建制，划分6个中心区域，建立中心县（市）委，直属党中央领导。省委撤销后，实际先后建立杭州、宁波、永嘉、台州、湖州、兰溪、永康、建德、东阳等9个中心县（市）委，后又恢复建立了浙南特委。1930年2月，中央决定在浙南组建红军。5月，浙南红军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下设3个师，最盛时达6000人左右，遍及20多县。1932年5月失败后，还有余部坚持斗争。

1930年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决定将各级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行动委员会。8月，中共浙南特委和杭州市委分别改为浙南和浙北总行动委员会，多数县委也改为县行委。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撤销了各级行委，浙南特委和各县委恢复了正常活动，并新建了浙北特委。1933年1月，中央派人在杭州建立了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由沈显定任书记。3月，沈显定被捕叛变，组织遭破坏。

在闽浙（皖）赣根据地浙西一翼，随着边区斗争的开展，也建立过一批党的组织，有特委、中心县委和县委等，分别隶属于赣东北省委、闽浙赣省委和皖浙赣省委及其有关特委领导。同时建立过相应的苏维埃政府、军分区、以及共青团组织。

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粟裕、刘英率领进入浙江后，在闽浙边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由红军挺进师汇合当地革命力量创建的浙南（含浙西南、浙东、浙东南）游击根据地，是党在南方的革命战略支点之一。当1935年10月挺进师与闽东特委会师时，商定建立闽浙边临时省委，以统一领导闽浙边区的反“清剿”斗争。11月举行会议，宣布临时省委正式成立，刘英任书记。同时建立了临时省军区和“少共”临时省委。省委曾下辖5个特委。1936年夏（一说5月）闽东特委退出了临时省委。此后，闽浙边临时省委继续领导浙南、浙西南、浙东

南、以及福鼎等游击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和斗争。在浙南和浙西南，分别建立过军分区和独立师，还建立过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和共青团浙南特委等。

红十三军失败后，在平阳、瑞安一带，仍有少数革命者坚持斗争，还建立过中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浙南委员会）和游击武装。1937年3月，浙南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平阳、瑞安县委，归闽浙边临时省委所属的浙南特委领导。

抗日战争前夕，除浙南、浙西南、浙东南地区外，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尽遭国民党破坏。1937年3月25日，闽浙边临时省委、临时省军区司令部发出了致国民党当局的《快邮代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倡议和谈。由于国民党当局没有和平诚意，5月第一次谈判破裂。七七事变后，闽浙边临时省委与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公署重开谈判。9月16日，在省委书记刘英的亲自参与下，达成了和平协议，在浙江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根据和平协议，挺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集中于平阳山门整训与待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一批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员获释出狱。朱镜我等人出狱后，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委派，到浙江做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1937年11月，成立了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徐洁身。1938年2月，东南分局派顾玉良来浙主持工作。同月，省临工委改为省工作委员会，由顾玉良任书记。在省（临）工委的活动区域内，恢复和建立了一批县委等组织。

抗战开始后，从外地汇集来浙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回乡工人、青年学生和文化界人士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对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也发挥了作用。在金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上海同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部分共产党员，于1937年12月建立了中共浙南特别工作委员会，去丽水开辟工作。

为统一浙江全省党组织的领导，并根据和平谈判后的形势，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东南分局决定，成立中共浙江省临时委员会，由刘英任书记；粟裕率闽浙边游击总队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参加抗日。中共浙江临时省委于1938年5月成立后（9月转为正式省委），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浙江省工委同时撤销。省委曾下辖8个特委和1个边委（后多数实行特派员制）。在省委和各特（边）委的领导下，全省有50多县建立了县委和县工委。此外，还建立过直属省委领导的中共浙赣铁路委

员会和温州中心县委。全省有近40个县建立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

1939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浙视察抗战，向中共浙江省委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浙江党组织的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强调指出：浙江的党组织经过1938年的大发展，今后要加强巩固工作，“巩固必须重于发展，质量必须重于数量”。在浙江党组织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9年7月，省委在平阳县凤卧乡召开了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抗战以来浙江党组织的工作，确定今后全省任务。大会选举产生了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和中共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刘英继续任省委书记，坚持在浙江领导斗争。

1942年2月，因叛徒出卖，省委书记刘英在温州被捕，省委机关同时遭破坏。5月18日，刘英在永康壮烈牺牲。省委被破坏后，其所属各特委（特派员）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坚持斗争。浙南特委归华中局领导。

根据党中央对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新的战略部署，苏南区党委指示浦东武装分批南渡，在浙东三北地区（指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和甬江以北地区）开辟敌后战场。1942年夏，谭启龙、何克希等人受华中局委派来浙东主持工作。汇合浙东地方党组织，于7月成立了浙东区党委，谭启龙任书记，统一领导浙东和上海浦东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斗争。8月，建立了三北游击司令部（后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番号）。区党委曾下辖6个地委、1个工委和1个地区特派员。在浙东区党委的领导下，创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内，正式建立过政权组织——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1945年1月召开的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浙东敌后临时参议会和浙东行政公署委员会，并建立了浙东行政公署。此外，还建立过工、青（筹）、妇（筹）等群众团体。

为开展苏浙地区的敌后抗日战争，1944年12月，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率部南下，与先期南下的新四军十六旅会师于长兴县境内。1945年1月建立了苏浙军区，统一领导苏南、浙西、浙东的抗日斗争。5月，成立了浙西区党委，金明任书记，同时建立浙西行政公署。区党委曾下辖2个地委和1个工委。在苏浙军区和浙西区党委的领导下，创建了浙西抗日根据地，8月华中局决定，浙西和苏南

两区党委合并，9月1日正式成立了苏浙区党委，粟裕任书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了争取国内和平，中共在重庆国共两党谈判中，作出了必要让步，决定将广东、浙江、苏南等8个解放区的人民军队撤退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浙东、浙西的新四军及党政机关，坚决遵照党中央的命令，立即行动。9月30日浙东游击纵队及党政干部开始北撤，11月在苏北涟水整编，浙东区党委撤销。10月2日苏浙军区浙西各部及党政干部开始北撤，20日到达苏北解放区，苏浙区党委也随之撤销。

抗战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渴望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却倒行逆施，发动了全面内战。内战爆发后，浙江党组织的主要任务：一是发展革命武装，加强武装斗争；二是在国统区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以配合全国战场，加快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

进入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后，浙江的党组织有较大的发展和变化。浙东区党委随军北撤时，确定了四明、金萧、三东地区特派员，领导和坚持原地斗争。同时成立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留守处。为了加强领导，发展浙东的革命形势，报经中央同意，于1947年1月成立了中共浙东工作委员会，刘清扬任书记，归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后改上海局）领导。同年10月刘清扬在上海被捕，为此上海局决定，1948年1月起浙东工委改为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顾德欢任书记。浙东（临）工委曾下辖7个地区工委和1个地区特派员。为加强对浙东各地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和农运工作的领导，建立了浙东行政公署临时总办事处、浙东行政公署、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浙东农民协会总会筹备会等组织。这一时期的浙东游击根据地，面积达3万余平方公里，并和浙南游击区相连接，被称为是南方7大游击根据地之一。

中共浙南特委一直坚持斗争，抗战胜利后改为直属华中分局领导。浙西南地区的处属特委和闽浙边委，后经合并，仍称处属特委，独立自主地开展斗争。1947年4月，浙南特委书记向华东局建议，5月华东局批准，浙南和处属两特委（浙南特委后改地委）划归闽浙赣区党委（后改省委）领导，直到浙江解放。浙南的政权

组织有浙南人民临时行政委员会和浙南行政公署。浙南和浙西南地区的武装组织分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和浙南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

杭州市一度有两个工委组织。一是中共杭州市临工委，抗战胜利后，领导力量得到了加强，并于1946年春改为杭州市工作委员会（曾一度实行特派员制）。另一是1947年12月，以浙江大学党支部为基础建立的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分别隶属于上海局外县工委和上海市委学委两个系统。为了实行统一领导，1949年3月，上海局派林枫来杭，建立了中共杭州市委，两工委同时撤销。杭州是国民党在浙江的统治中心，浙江的“第二条战线”主要在杭州展开，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1947年10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唤起了越来越多的爱国者的觉醒，教员罢教、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抗议国民党惨杀学生的暴行。于子三运动成为浙江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的突出事件。

苏浙区党委随军北撤时，委任特派员留浙西领导斗争。同时，苏浙皖特委决定，在江苏宜兴成立了中共浙西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新四军浙西留守处）。工委成员在返回浙西途中遭敌袭击，书记被捕，工委随之消失。1948年1月建立杭嘉湖工委后，浙西特派员撤销。尔后，杭嘉湖工委与淞沪工委合并为淞沪杭嘉湖工委，不久即遭破坏。在浙皖地区的淳安、分水、昌化、孝丰等地，也发展建立过党、政组织。

1949年2月，在金华成立了闽浙边城市工作委员会（闽浙赣省委城工部所属），统一领导城工部在浙江建立的组织。

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第七兵团及随军南下来浙江工作的干部，在途抵安徽蚌埠时，于1949年2月成立了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为接管浙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南下的形势鼓舞下，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和浙南游击纵队，在中共浙东临工委和浙南地委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军主动出击，或经策反，先后解放了一批县城。杭州市委为迎接解放，对护厂护校和保护钱塘江大桥，也作出了努力。

南下大军于5月3日解放杭州。接着，各路解放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英

勇挺进，至10月3日，浙江大陆全部解放。1950年5月17日解放舟山本岛。1955年2月26日解放南麂山岛。至此浙江全境解放。

杭州解放后，1949年5月6日，成立了以谭震林为书记的中共浙江省委。5月7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7月29日成立了浙江省人民政府（8月18日正式对外宣布）。浙江省委成立后，5月10日和6月18日，先后在杭州市召开了两次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的会师大会。省委高度评价了浙江地方党组织在坚持敌后斗争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为浙江解放作出的重要贡献，并根据中央关于接管城市的工作方针，作了具体部署。8000余名南下干部和参加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以及坚持斗争的地方干部组成了各级领导班子和工作部门。2.2万多名坚持敌后斗争的武装人员奉命整编入各有关军分区。

浙江解放后，处在执政党地位的中共浙江省委和各级党组织，肩负起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使命。

1949年至1952年的3年间，省委主要是带领全省人民医治战争创伤，剿匪反霸和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稳定市场，平抑物价，使财政经济状况得到基本好转。1953年起，宣传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省委抽调一批干部，支援国家重点建设。至1956年，全省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这头7年里，省委把培养选拔干部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大胆选拔德才兼备的干部，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委还开办了干部学校和干部培训班，招收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工农积极分子，通过培训，充实了干部队伍，从而了解放初期干部严重不足的困难。

省委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1950年，省委遵照党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了整风，这对克服党内、首先是党的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等，起到了重要作用。省委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结合“三反”运动，整顿了党的组织。这次整党，以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和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党员进行了登记。

全省还本着“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培养和发展一批新党员，并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逐步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

党的八大后，省委在八大方针指引下，领导全省人民艰苦奋斗，到1957年底，胜利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

1957年，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部署了整风运动，并开展反右派斗争。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全省有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1958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省委又抽调大批干部，加强本省工业建设。为了探索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省委在贯彻执行总路线的同时，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1959年又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使得一部分党的干部受到了错误批判，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工作中的失误和自然灾害等原因，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1961年后，省委和各级党委贯彻执行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精神，发扬民主，总结经验，同心同德，共渡难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同时对“反右倾”斗争以来被错误批判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给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帽子。这些经济的和政治的措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克服了严重经济困难，使全省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

1963年至1965年5月，省委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的部署，在部分县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一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作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来对待，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和处理。

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7年，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既经受了胜利的考验，也经受了严重挫折和困难的考验，在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浙江的决心和信心。10年建设，虽有过失误，但还是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有较大的增长，各项事业有较大的发展，为浙江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为农业的综合发展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内，共召开过3次省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浙江省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委员会。省委领导成员在各届任期内均作过一些调整。

1966年5月和8月，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开始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浙江于6月初从文化、教育战线开始，迅速扩展到各条战线和各个领域。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浙江出现造反派全面夺权。全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党的组织生活被迫停止。

为了稳定浙江局势，1967年3月15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8月，军管会改组后，南萍、陈励耘挑动派性，使武斗不断升级。

1968年3月18日，中央批准成立军、干、群三结合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24日省革委会正式宣布成立。同时建立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取代了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

省革委会成立后，“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斗、批、改”阶段。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继续受到打击和迫害。把广大原有的机关干部，诬为“旧人员”，“黑班底”，被下放农村，或送进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3月，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改名为中共浙江省核心小组。以后，各地（市）、县陆续恢复建立党委，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国出逃，机毁人亡）后，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1972年4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处理浙江问题的〔1972〕16号文件，南萍等人因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被责令停职检查交代；中央派谭启龙、铁瑛主持浙江省委和省革委会的工作。1973年5月，省委作了大的调整。省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解放了大批干部，使许多老干部重新回到各级领导岗位。各项工作出现了转机。

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使浙江形势又发生大的反复。运动一开始，江青就插手浙江。帮派骨干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纠集“反潮流”分子，建立起凌驾于党委之上的“批林批孔”小组，并强行列席省委常委会议。要挟召开“三全会”（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党委全会），搞会内会外结合，层层揪“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再次把重新工作的老干部打下去。在此前后，在浙江还发生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简称“双突”）的严重错误。